

第一部分

中国古代史

一、概述

我国素以历史悠久闻名于世，是世界上惟一的文化传统延续至今未曾中断的文明古国。有明确文字记载、可以考实的历史有将近四千年之久，以考古学、文化人类学相结合，可以认识的文明史长达五千年以上。我国形成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也相当久远，在不同历史时期，中华民族的先人，共同生活在辽阔的疆域上，通过不同文化的碰撞、冲突、交流、融合，共同创造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中华文明是辉煌壮丽的，在若干历史时期内，我们的文明发展水平走在世界的前列。中华文明是对世界历史的进步做出了巨大贡献的，不仅对周边国家和地区产生过举足轻重的影响，还曾经对更为遥远的地域发挥过独特的推动作用。法国的著名学者谢和耐（Jacques Gernet）教授曾经动情地说：“中国文明曾是人类中很大一部分的启迪影响者，将其文字、技术、人生观和世界观、宗教和政治制度赐予了全人类的这一部分。朝鲜、日本、越南等国家也都属于同一文明圈。但中国影响的辐射范围已经远远地超越了这些地区……它也触及到了一些更为遥远的地区。”他说，西方欠下了中国的“文明债”，如果西方不曾借鉴中国，“就不可能具有它今天的面貌”（《中国社会史》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年，1—2页）。“欠债”之说当然是善意的笑谈，倒也可以使中国人产生历史的自豪感，其实更重要的是应该思量如何才能不愧对祖先所创造的辉煌。

想要在有限的篇幅内，对悠久、辉煌、丰富而又复杂的中国古代史加以概述，难度相当大。让我们以历史年代为序，按照传统史学“大断代”的方法，共同探讨古史的深邃与奥妙。

我国境内发现了为数众多的早期猿人遗址、遗物，为进一步解决人类起源问题提供系统而珍贵的材料。特别应该指出的是，除了世界学术界广泛关注的元谋人、蓝田人、北京人之外，近年间所发现和报道的安徽繁昌“人字洞”猿人遗址、重庆“巫山人”的新材料，把我国境内所见的早期猿人的出现时间，提前到距今200—250万年，从而有力地证明了中国是人类文明的重要起源地之一。

新石器时代 特别是在它的中晚期“文明”的因素开始出现。在我国野外考古所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已达到七千多处。其中的仰韶文化、河姆渡文化、大汶口文化、红山文化、龙山文化、良渚文化、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等，各有其重大发现和重要价值。这证明了我国古代文化的源远流长、异彩纷呈和多元一体。中国文化是在本土独立发生、发展的结论，日益为中外学术界普遍接受。

司马迁著《史记》以《五帝本纪》为开篇之作 以黄帝为正式记载的第一位上古帝王，而战国诸子早把黄帝奉为古史传说的中心人物，于是 黄帝被华夏后人尊为“人文初祖”；《五帝本纪》叙事上溯至炎帝 炎黄时期就成为中国早期文明的代名词。直到今天，说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史，也是以炎黄时期为开端的。

我国夏王朝之前的历史，没有可信的文字记载，主要是靠神话与传说保存至今的，它与信史的区别是明显的。考古工作的一系列重大收获，使人们了解到与传说根本不同的远古历史的片断。早在19世纪20—40年代，部分卓有见识的学者就开始了富有创新意义的工作：试图把当时所知的考古成果与古史传说结合起来，重新构建和解释上古历史。徐旭生先生的《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1943年）不仅从理论上全面探讨了研究传说时代的方法，还将上古部族划分为华夏、东夷、苗蛮三大集团，这一重大建树，直到现在仍得到古史学界的承认和尊重。

在习惯上又被划分为夏、商、西周与春秋战国两个阶段。

夏、商、西周时期 在我国传统的历史体系中 被称为“三代”是古代士人仰慕和歌颂的“盛世”自近代以来 随着人们对人类社会发展史的真正了解，它被重新定位为中国古代国家形成和发展的第一个阶段，依然受到学术界的高度重视；而按照当代考古学的划分，它属于中国的“青铜时代”。

夏朝是我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王朝。大禹经过有意操作，把权位传给了儿子启。这标志着古老的“禅让”传统被破坏 以父子世袭为特征的“家天下”统治秩序从此确立。由大禹立国到夏桀亡国，夏历十七王、400余年。考古所见介于龙山文化和早商文化之间的文化遗存，特别是二里

头文化的大型宫殿建筑、青铜器、玉器的出土，使夏王朝的历史地位得到印证。傅斯年揭示的“夷夏东西说”对了解夏朝的国家形态、发展脉络有重大意义。

商朝 从成汤立国到帝辛（纣）亡国，共传十七世三十一王，历时500多年。出土于安阳小屯村的甲骨文，是相当成熟的文字系统。甲骨卜辞所记载的内容涉及商代的政治、经济、军事、宗教、文化各个方面，从而使商代的历史奠定在有文字记载的基础之上。商代的青铜文化光辉灿烂，经济获得明显进步，国家统治职能有了进一步发展（建立了较为复杂的官僚机构、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强化了法律的镇压职能）但氏族依然是社会的基本结构形式；“祖先崇拜”与“上帝崇拜”的合一使社会笼罩于神权统治之下。

西周 王朝从武王灭商开国，到幽王亡国，传十一世十二王，历时200余年。其中的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是我国历史有确切纪年的开始，也是近年来“夏商周断代工程”（见下）由以展开的支撑点之一。与商王朝相比较，西周的统治有其鲜明的特点：其一，重视国家的制度建设，包括宗法制、分封制、井田制、官制在内的“周礼”体系得以确立。古人喜欢用“周公制礼作乐”来表述，其实应该是一个更为长期的过程。其二，重视总结、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在周初的几篇著名的《诰》中提出了“明德”“慎罚”的主张，开“以德治国”“德主刑辅”治国思想之先河。其三，政治疆域和文化影响区域大大拓展，这与“分封制”的大规模推行密切相关。可以说，这是一个神权下降、王权强化、人文精神崛起的时代。

春秋战国 起于周平王东迁洛邑（公元前770年）止于秦灭六国完成统一（公元前221年），这是一个大动荡、大变革的时代，为我国著名的历史转折时期。在政治上，王室权威由衰微而归于消亡，春秋霸主政治成为维持社会秩序的稳定器，战国的兼并战争则是统一战争的前奏曲和组成部分；战国的变法运动，破坏了贵族等级社会，造就了一系列新的制度，君主集权制、官僚制、郡县制以及重农抑商政策纷纷出现并对此后的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经济上，伴随着铁器时代的到来，社会生产力迅速提高，促成了农业、手工业、商业的空前发展。在社会结构

上，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族组织陷入瓦解，个体农民家庭大量出现；拥有独立身份的“编户齐民”成为国家统治的基础，多种形式的奴隶劳动依然存在。在文化上表现出空前的繁荣。战国‘百家争鸣’的辉煌历程至今仍被国人引以为豪，诗经、楚辞、诸子散文，都在历史上有不可替代的地位。

秦汉时期，起于秦王嬴政荡平六国建立统一帝国（公元前 221 年），止于曹丕废汉献帝自立（公元 220 年）也有人主张以“董卓之乱”（公元 190 年）爆发、东汉政权名存实亡为其下限。这种界定，注意到国家政治与社会状况实际发生的巨大变化，把“董卓之乱”之后三十年的军阀混战历史与一统天下的东汉政权加以区别，将其归入三国时代，使之成为魏晋南北朝历史的组成部分。

共有 400 多年历史的秦汉时期，依据政权的嬗变，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秦：公元前 221 年~前 206 年 西汉：公元前 202 年~公元 8 年 王莽新朝：公元 8 年~23 年 东汉：公元 25 年~220 年。

在我国悠久的历史中，秦汉时期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主要表现在：

其一，以皇帝为中心的中央集权制政体的确立和巩固。以君主为中心的中央集权制政体，出现在战国变法运动时期。及秦统一六国，创建了突出君主至尊地位的皇帝制度，使天下之人尽为其臣仆；同时，为了有效地统治前所未有的帝国版图，君臣经过认真讨论，决定在全国范围内推行郡县制度。通过对郡县长官的统一任命、考核、奖惩，从而使地方的行政管理权集中于中央，而中央的最高权力又操于皇帝之手。皇帝不仅是国家元首，还是实际上的最高行政首脑、最高的军事统帅、最高的立法者和最后的司法裁定者。

继秦而兴的西汉王朝，全面继承了秦的政治制度、法律制度，故有“汉承秦制”之说。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上，与秦相比较，也有损益变革。汉初改变秦单一的郡县制而推行“郡国并行”之制，即在不同地区分别实施郡县制、封国制两种制度。景帝时期爆发的“吴楚七国叛乱”把“郡国并行”之制容易导致“尾大不掉”的消极面凸显出来，汉朝廷不得不极

力加以补救。直到汉武帝时这一过程才告结束，所封王国的独立性因素不再存在，其地位实际上与郡无异。对地方官员的监察力度，也在不断加强。汉武帝时期设立的十三部（州）刺史，标志着它实现了制度化。通过以上制度、政策的继承与调整，以皇帝为中心的中央集权制政体在汉代得到了完善和巩固。

其二，长期统一奠定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根基。作为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段，秦汉与它之前的先秦、之后的魏晋南北朝两个时代相比较，最大区别，就在于它长期维持着统一的政治格局。国家避免了大规模战争的冲击；经济与文化在社会保持基本稳定的前提下，得以恢复和发展；综合国力较为强大，为解除外来战争威胁、掌握外交主动权奠定了基础。“文景之治”、“武帝更化”、“昭宣盛世”、“光武中兴”、“明章之治”的连续出现，就是最好的证明。统一有利于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在这一时段表现得非常典型。

秦汉时期是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史上极为重要的一个阶段，它的贡献和影响，仅仅从开拓疆域、确立中国腹地大格局之中来寻求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从养成国家统一的心态历程中加以阐述（参见第五讲）。统一国家所形成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之大，确实是前所未有的。

其三，奋发进取精神推动了走向世界的步伐。汉代士人以积极进取的精神风貌，发扬光大了“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的传统理念。快意恩仇的游侠、专断敢行的酷吏、“自炫鬻”的名士、立功异域的能臣，以群体的方式，把进取精神发挥到极致。东汉开国功臣马援一生进取，“丈夫为志，穷当益坚，老当益壮”的慷慨激越，“男儿要当死于边野，以马革裹尸还葬”的豪气万丈，激励了多少后人！正是具备了这种锐意进取的精神，他们才能在历史舞台上施展抱负，建功立业。他们所处的时代才能充溢着雄壮激昂的气氛而令后世仰慕。

探险西域的张骞、经营西域而名垂青史的班超，更是积极进取精神的体现者。班超由一介书生而投笔从戎，以“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精神，终成定远之业。“丝绸之路”的开通，使得汉代中国与世界融为一体（参见第五讲）。

魏晋南北朝时期起于曹丕废汉自立（公元220年）止于隋灭陈（公元589年），如果加上东汉末年三十年战乱时间，历时将近400年。它有如下特点：

其一，政治局面：长期分裂割据。除了西晋有短暂的统一之外，分裂割据是这一阶段的基本格局。在这种局面之下，既有残酷的战争掠夺，也有对峙之下的竞争和发展。把它视为“黑暗世纪”的看法，早已被摒弃。

其二，民族关系：在冲突中走向融合。魏晋南北朝时期在我国历史上以民族冲突激烈引人注目，不同文化互相冲突、交流并趋向融合构成了它的时代特色。

在游牧民族力图征服中原的时候，民族矛盾曾经发展到民族仇杀的程度，制造过赤地千里的惨剧。当他们在中原建立起政权之后，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他们不得不思考如何笼络占据人口大多数的汉族人民。于是推行“汉化”政策就成了他们不约而同的选择。野蛮的征服者往往被文明水平更高的被征服者所征服，中国历史上少数民族政权“主动”汉化的过程就是明显的例证。少数民族政权的汉化构成了民族融合的主流方向。它的主要表现方式是：（1）尊崇以儒学经典为核心的汉族文化传统，推行儒学教育，成为胡汉文化最容易出现的结合点。儒学作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文化内聚力的作用，表现的十分明显。（2）抛弃“胡汉分治”的体制，缓和民族矛盾。（3）重用汉族俊杰，特别是高门士族的代表人物，以收民望，通过士族的中介作用，逐渐取得汉族民众的认可和臣服。（4）推行汉族的服饰、语言、姓氏等风俗文化，实行胡汉之间的通婚，把汉化推向心理、血缘的层面。北魏孝文帝的汉化政策在这一方面是最为彻底的。魏晋南北朝的民族融合，为隋唐统一多民族国家把华夏文明推向新的辉煌，奠定了基础。

其三，国家制度：承秦汉启隋唐。这一时期的许多制度，表现出承前启后的过渡性。如选官用人制度，自察举、征辟之制经由“九品中正”制向科举制过渡；中央中枢机构，自“三公九卿”制向“三省六部”制转变；军事制度，出现于北朝的府兵制，发展成为隋唐府兵制的根基；赋税

制度 曹魏的租调制是隋唐租庸调制的滥觞 土地制度 从曹魏“屯田”西晋“占田”发展到北魏“均田”为隋唐“均田制”所直接继承。这些发展中的重要制度，不仅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支撑着国家机器的运转，而且为隋唐盛世的出现提供了制度保证。

其四，士族政治：在盛极而衰的过程中显示其特色与能量 参见第七讲。

其五，思想文化：包容异质和张扬个性 源自印度的佛教得到迅速传播，面对这种来自异域的异质文化，尽管也曾发生过个别统治者的“毁佛”事件 出现过道教与佛教的相互排斥和斗争 但是 从整个社会心态而言 却呈现出极大的包容性。其普及范围之广、影响人心之深 令人惊异。玄学的崛起以及它在士族阶层中的长期流行，是非常重要的文化现象。与汉代经学相比较 崇尚自然和自由、张扬个性的玄学 具有冲破思想禁锢的意义。它在中国思想史上留下了独特的轨迹和光彩。

隋唐时期在中国帝制时代的历史上是一个繁荣发展的时期。

隋朝是一个短命的王朝，但是它彻底结束了近400年来分裂割据的局面，为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而且，隋文帝和隋炀帝制定了许多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政治经济措施和制度，为唐朝社会的全面繁荣奠定了基础。隋炀帝巩固统一意识非常强烈，由于国家控制了大量的自耕农，他能够进行许多大工程建设和大规模的征伐，但忽略了百姓的承受能力，最终酿成暴政，隋朝被农民起义推翻。

唐朝因为有“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而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的黄金时代。“贞观之治”出现的背景主要是 隋末农民战争对社会结构阶级关系的进一步调整，士族门阀和地方豪强的势力受到冲击，农民起义的伟大力量使唐太宗君臣认识到百姓安定是国家稳定的基本前提。贞观时期是一个治世却很难说是一个盛世，天下大乱之后迅速达到天下大治，政治清明和社会稳定，民族关系相对融洽，而在经济上却还远没有达到隋朝盛时的水平。贞观以后的唐高宗武则天统治时期，尽管宫廷斗争错综复杂，但是社会继续保持稳定，自耕农走上比较稳定的发展轨迹，国家与百姓处于相对理想的状态。随着制度的调整，国力有所增长，

人民生活也得到改善。随着唐玄宗即位后皇位的稳定，很快迎来了一个繁荣昌盛的时代。但是，唐初立国的社会结构和制度都面临着重大转型，各方面的制度都在发生着深层次的变革。在这种转型过程中，选官问题、军事体制问题、边疆问题、财政问题等都出现了新的矛盾。而唐玄宗晚年的朝政又不理想，最终导致了安史之乱的爆发。

安史之乱在政治上导致了藩镇割据和宦官专权局面的出现，以及政治体制一些变革的继续；在社会经济上影响了经济文化重心的南移，以及社会开放心理的笼缩；在思想文化上则促进了士大夫经世思想上抬头和唐宋间思想的转型。安史之乱以后唐朝还统治了将近一个半世纪，但最终灭亡在农民起义的烽火和藩镇割据的斗争中。

五代十国是唐后期藩镇割据局面的继续和发展，北方的五个朝代和南方的割据政权都是由地方势力发展起来的。但朱温建立后梁，也是北方政局走向有序化的开始。五代时期统一的趋势在发展。契丹是与先后存在于北方的五个朝代和南方的割据政权并存的一大政治版块，并进而影响到宋朝。

北宋是在五代政治地理格局的基础上建立的，它同时面对着南方的割据政权和北方的契丹国辽朝。由于赵匡胤事先作了精心部署，陈桥兵变后并未失控，一切都井然有序，开始摆脱晚唐五代以来兵变以后出现的无序状态，形成了祖宗“以仁义开国”的良好开端。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宋朝政治文化中的宽厚温仁色彩。北宋建立后，采取先南后北的战略统一了全国，通过“杯酒释兵权”等措施，进一步加强了专制统治。从仁宗时期开始，祖宗家法的束缚开始呈现出来，面对辽朝和西夏的压力，以及国内社会矛盾的发展，宋朝逐渐陷入积贫积弱的局面，也出现了改革运动如庆历新政、王安石变法等。王安石的改革思想对北宋的政风和学风产生了重大影响，但没有真正实现富国强兵的目标。

女真族的兴起和金灭辽，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当时的东亚国际形势。南宋是在逃避金朝的追击中建立和稳定下来的，它同时还面临着国内的农民反抗斗争。宋金双方达成和议后，两国关系主要围绕着如何落实和修改和议展开。金朝迁都燕京（今北京）后，势力达于极盛。但华北地

区的民族矛盾一直没有解决，不久就在境内农民斗争的冲击和南下蒙古军的打击下走向灭亡。南宋政治上多有权臣掣肘，建树不多，军事上一直不振，但士大夫高自标置，理学得到发展。

辽、宋、夏、金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民族战争最频繁、民族融合也最深入的时期。各民族经济文化交流密切，边疆民族地区经济进一步开发，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进入到一个新阶段。在两宋境内，社会生产有了很大发展，农业、手工业和商业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城市繁荣，海外贸易兴盛。

蒙古灭金后，南宋与蒙古正面冲突。经过将近半个世纪的战争，在蒙古铁蹄下坚持最久的南宋最终灭亡。蒙古征服了金和南宋，建立了统一的元朝。元朝对地方和边疆的有效统治，对于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疆域的奠定起到了很大作用。在整个元朝的历史上，除了前期发生过蒙古宗王的叛乱以外，很少有周边民族的反叛和外国入侵，是中国历史上极少见的没有外患的朝代。元朝的统治，对于中国民族关系的格局也产生了重大影响。蒙古在进入汉地以前对中原文明全无接触和了解，不易接受汉地的典章制度。元朝又具有蒙古“世界帝国”的特点。漠北草原始终在元朝的政治中占有重要地位，草原本位政策不可能彻底放弃。元朝国家制度的最大特点是“蒙汉杂糅”，各种来源不同的制度构成一个混杂的体系而运作。元朝的对外关系具有很大的开放性和世界意义，被认为是中国和欧洲东西方之间真正直接接触的开始。

明朝的建立既是对蒙古族统治的颠覆，又是对宋元统治方式的继承和改创。朱元璋进行了大规模的立法创制，中国自秦汉以来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治体制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和强化。不设丞相，视士大夫如仆隶，通过特务政治控制官僚集团，甚至搞文字狱等，就成为明朝长期实行的“祖制”。但是，专制皇权走向极端的同时，也出现了异化。明代中后期宦官专权和朋党之争愈演愈烈，皇权本身也陷入文官系统的包围和约束之中。最后在农民起义的打击下，明朝被清朝所取代。

清朝建立后，在制度上解决了困扰历代王朝中央集权专制主义的一些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都是以皇权的强化为前提的。在此基础上，

边疆得到巩固,文化事业有了发展,出现了“康乾盛世”。但文化专制也进一步发展,文字狱频繁出现,整个思想文化领域笼罩着皇权的专制权威。中国就是在这样的体制下被迫迎接世界潮流的。

从 15 世纪开始,世界就在从分散发展走向整体发展。西方的海外扩张是当今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形成的开端。传教士作为代表西方文化的知识精英在明朝中后期来到中国,开始了与中国士大夫的直接交流。但好景不长,没有达成两种文化的融合。总体上说,明清时期处于世界一体化进程的初期阶段,但古老的中华帝国对此却知之甚少,更不要说如何应对了。明朝中期开始,中国传统社会经济出现了深刻的转型,给当时的经济关系、社会生活和思想文化都打上了深深的印记。但是专制主义的极端强化,使得新的生产关系无法成长为主流,也无法融入到世界潮流之中。在走向世界史意义的“近代”的时候,中国从一个固步自封的盛世迅速陷入灾难的深渊。

二、夏、商、西周历史发展脉络中几个备受学界关注的重大问题

夏、商、西周史的研究与国家起源、文明演进等重大史学理论密切相关,又受到一系列考古成果的推动,故特别引人注目。近年间学术界普遍关注的重大问题,至少可以举出下列四项:

(一) 夏商周断代工程

夏商周断代工程,是国家“九五规划”重中之重的历史年代学攻关项目。它酝酿于 1995 年,启动于 1996 年 5 月 16 日,各个专题研究完成于 1999 年 9 月,2000 年 9 月夏商周断代工程验收工作顺利通过,标志着它的完全结束。《夏商周断代工程 1996—2000 年阶段成果报告》的出版(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0 年 10 月),把工程的主要研究成果与数据公布于世。

断代工程的任务,是为夏商周三代确立一份可信的历史年表。中国文明历史悠久,而且绵延至今未曾中断,这是举世公认的。但中国文明

早期的夏商周三代却没有完整可信的年代学标尺。古代文献记载中最早的可信年代是公元前 841 年 即司马迁在《史记·十二诸侯年表》所记载的西周晚期的共和元年。自此以下有逐年记事之文，自此而上的《三代世表》有世而无年。古史渺茫无从稽考的困惑，因年代不明而更加显著。这是我国上古史研究中的重大缺憾。为夏商周确立年代学标尺，具备多方面的意义。

“工程”设计了九个大课题 39 个专题，几年间直接参加断代工程的专家学者达 200 余人，涉及考古学、历史文献学、历史地理学、古文字学、天文学、测年技术科学等众多领域。它是多学科相结合、集中了全国学术精华的世纪工程。

根据各历史阶段研究条件的差异，“工程”提出了不同的具体目标：
1. 西周共和元年以前各王，提出比较准确的年代；
2. 商代后期（商王武丁以下）各王，提出比较准确的年代；
3. 商代前期，提出比较详细的年代框架；
4. 夏代 提出基本的年代框架。经过四年的多学科合作、联合攻关 以上设定的目标都已达到。在《成果报告》中开列了三代年表的主要数据：夏王朝的年代框架是公元前 2070—1600 年；商王朝的年代框架是前 1600—1046 年，其中作为划分前后期界标的“盘庚迁殷”，被定为前 1300 年 盘庚以下各王在位年代一一列出 商周之交的“牧野之战”的年代确定为前 1046 年，武王以下各王在位年代全部列出。

除了上述具体成果之外，夏商周断代工程更可以提供方法论上的意义和启示：对重大的人文社会科学问题，由国家统一组织、调配全国的人力、物力 做集体攻关式的研究 是必要的、也是有效的 跨学科综合研究的方法，特别是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交叉与结合，充分显示了它的优越性。

需要稍加说明的是，夏商周断代工程意义重大，影响所及已经超出了学术界的范围 但招致了许多尖锐的质疑与批评。有关对“工程”提出的不同意见 可以参见刘星《缺席的对话——夏商周断代工程引起的海外学术讨论纪实》（《中国文物报》2001 年 6 月 6 日）张立东《面对面的对话——“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美国之旅》（《中国文物报》2002 年 5 月 24

日)针对来自海外的质疑,李学勤等人发表了《美国之行答问 关于“夏商周断代工程”》一文(《中国文物报》2002年8月16日),正面阐述了相关问题。表明对“工程”的讨论还有待展开。

(二) “二里头文化”与夏史探讨

进入近现代以来,有一部分国内外的著名学者,对夏王朝的信史地位产生了怀疑。由于传世文献中有关夏王朝的记载,都出于后人追记,就使得怀疑论有了依据。于是他们把夏王朝归入了“传说时代”。王国维先生利用了安阳殷墟所出甲骨文的材料,讨论了《史记·殷本纪》所载商王朝建国之前的“先公先王”的可信性,并进而分析商的“先公先王”是生活在夏王朝时期的,那么同出于司马迁之手的《夏本纪》就应该有写作的依据,不可能出于虚构。这就为重新恢复夏王朝的信史地位,提供了与考古学相联系的思路。1959年,著名学者徐旭生先生根据上古文献所记夏人活动中心在晋南豫西的线索,亲赴该地进行了影响深远的“夏墟调查”。当年秋天,二里头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正式开始。这两件事标志着拉开了依靠考古学探索夏文化的历史序幕。

二里头遗址位于河南偃师县(今为市),1981年它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这里设立了二里头工作队,组织了数十次考古发掘,取得了大批震惊学术界的成果。《偃师二里头》一书(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为人们了解和利用这些成果提供了便利。

二里头文化的年代,大体介于河南龙山文化——郑州早商文化之间,延续时间约为400年以上。在二期遗存中出土了大中型夯土建筑基址、铸铜基址、墓葬。在三期遗存中发现两座大型宫殿基址、大型铸铜遗址,其中的一号宫殿基址坐北朝南,总面积超过一万平方米以上。布局严谨,主次分明,从平面结构而言,它开创了我国宫殿建筑的先河。此外,还先后出土了许多制作精美的玉器、青铜器。由于二里头文化所处地域、延续时间均与文献记载中的夏王朝相符,出土遗址遗物又代表了当时的最高水平,所以越来越多的学者赞同它是夏王朝的都城所在地。

二里头文化与夏文化的关系，现在学术界存在的主要争议是，有人认为它包括了夏王朝的全部历史，多数学者相信它只是夏王朝晚期的都城，早期夏文化应该到河南龙山文化晚期中寻找（参见赵芝荃《简论夏朝的断代问题》，《中原文物》1999年1期）。

夏文化的考古学探讨，除了以二里头文化为主体展开之外，在其它地区也有重大收获。1977年11月国家文物局召开了“河南登封告城遗址发掘现场会”。在告城遗址的第二期遗存中，发现了两座相连的夯土城堡遗址，经测定为距今四千年左右，相当于夏代早期。有的学者推测，此地就是文献所载“禹都阳城”所在地。1983年在河南省偃师市发现了一座商代早期城址——尸乡沟商城。在夏商周断代工程启动之后，认定其中的内城修建于夏商之交，由此确定了它的特殊价值——它标明了夏文化的终止年代。

（三）甲骨文的发现与晚期殷都的确认

甲骨文的发现，是19世纪20世纪之交中国考古学最重要的发现之一。它不仅提供了研究商史的第一手资料，还打开了安阳殷墟这座商代晚期都城的大门，使商史研究进入全新的阶段。

清朝末年，带字甲骨出土于河南安阳城西北约3公里处的小屯村。1899年，时任国子监祭酒的王懿荣在北京发现了带字甲骨，即以高价收购。王懿荣山东省福山县人，博览经史，尤以精通金石学而著称。他以金文相印证，判定这是殷代的遗物和文字。王懿荣成为最早发现甲骨文的学者。1899年也成为甲骨学史的开端。金石学家刘鹗，字铁云，是王懿荣的好友，曾参与了甲骨辨识的工作。1903年，刘鹗选拓1058片龟板，印成《铁云藏龟》一书出版。这是甲骨文的第一部著录之作。

甲骨文被发现已逾一个世纪，累计出土数量约15万片。出现的单字不足5000个，已被释读的约1700多个，其中被多数学者所认可的释读文字仅1000字上下。甲骨文的出土是一个连绵不断的过程，其中，有三次集中出土：（一）1936年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小屯东北地发掘出带字甲骨17096片；（二）197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安阳工作队

在小屯南地发掘出带字甲骨5335片(三)1991年安阳工作队在花园庄发现一个甲骨坑,共有甲骨1583片,其中带字甲骨579片。它的数量虽较前两次为少,但意义重大——珍贵的大版卜甲集中出现,完整的刻辞卜甲达到300多版,为此前所未见;依据地层关系和卜辞内容,推测其年代当为商王武丁早期。

甲骨卜辞是商代的占卜记录。商代“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占卜之风极为盛行,达到了“事无不卜”的程度。也正因为如此,卜辞所反映的内容极为广泛,涉及政治、军事、经济、祭祀、原始宗教、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张光直先生在《商代文明》一书中,把甲骨规定为“通向商代文明的五道门径”之一(其余为传统历史文献、青铜器、考古学、理论模式),足以说明对研究商代历史而言,其价值是无可替代的。关于甲骨文的著录之作,可谓不胜枚举。《甲骨文合集》、《甲骨文合集续编》两部集大成之作,为研究者提供了极大的便利。至于对甲骨学的综合性研究之作,以王宇信先生的《甲骨学通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最负盛名。

甲骨文对商史研究的推动作用,表现在许多方面。小屯村一带作为商代后期都城的确认,就是其中之一。1928——1937年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对殷墟进行了15次发掘。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在这里进行了20多次发掘。先后发现了宫殿宗庙建筑基址、西北岗王陵区、祭祀区、妇好墓、铸铜作坊、制骨作坊,充分显示出殷墟文化内涵之丰富。在这里出土的司母戊大方鼎,是罕见的青铜重器,是体现商代青铜文明水平的典型器物。妇好墓共出土文物1928件,特别是有铭文的青铜器多达190件,并且半数带有“妇好”的自铭。它被誉为商代的文物和艺术宝库。妇好又屡见于甲骨记载,她是武丁的配偶之一,还多次主持大规模的祭祀和征伐活动。

安阳殷墟作为商代都城始于哪一个商王?学术界还存在不同看法。传统之说依据《史记·殷本纪·正义》注引《竹书纪年》的材料“自盘庚迁殷至纣之灭,二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把安阳殷墟当作自盘庚至帝辛时期的都城所在地。但有学者对传统之说提出了异议,认为所见甲骨

的最早年代是武丁时期,而此前三王(盘庚、小辛、小乙)时期的甲骨未见於殷墟。此外结合考古材料来看,所发现的宫殿基址、墓葬,最早的年代也是武丁时期。特别是在安阳市西北郊的三家庄、董王度为中心的洹河以北地区,考古发掘所出青铜器的器型、文饰,皆有从郑州二里岗早期商文化向小屯武丁期文化过渡的特征。综合宫殿、墓葬、青铜器、甲骨文的分期研究,近年间学界已经倾向认定殷墟作为都城应始于武丁而非盘庚(参见杨锡璋《殷墟的年代和性质问题》,《中原文物》1991年第1期;谷飞《殷墟王陵问题之再考察》,《考古》1994年第10期)。特别是1999年年底,在安阳洹河北岸发现一座占地4平方公里的城址,经专家鉴定命名为商代中期城址。据推测这里可能是盘庚等三王的都城(《光明日报》2000年1月8日)。由此看来,安阳作为都城始于武丁时期的可能性居多。

(四) 西周分封制所确立的等级隶属制

分封制,古籍多称“封建”,即“封藩建卫”的简称“之制”。为了与作为社会形态的“封建社会”概念相区别,中国大陆学者采用了这一习惯性称谓。

分封制与宗法制同为支撑周代政权的两大支柱,在《诗经·大雅·板》中有明确表述:“大邦维屏,大宗维翰。”把经由分封制而建立的大国尊为周王室的屏障,这就是周人心目中对分封制的定位。分封制确实为巩固、维持周王室的统治,发挥过至关重要的作用。

西周分封制的实行情况大致是:京城周围的一定区域被规定为“王畿”,周人称之为“邦畿千里”,由天子实施直接统治,王畿以外的广大地区,天子分封诸侯立国,使他们在封地内行使管辖权。诸侯分封卿大夫为下级贵族,也是分封制的重要内容。《左传·桓公二年》概述了分封制下的等级制:“故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有二宗,……皆有等衰。”《左传·昭公七年》更有“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之说。《礼记·礼运》集中表述为“天子有田以处其子孙,诸侯有国以处其子孙,大夫有采以处其子孙,是谓制度。”可见,分封制造成了土地和政治权力的层层分